

三公经费只晒晒还不够

7月18日,青岛,尹先生从公交车公司374路车队领回了3000多元赔偿款。尹先生称,一个月前,由于司机操作失误,尹先生在374路车上摔破了头,随后与车队达成协议,赔偿他3000多元,但领钱的时候居然全是硬币。尹先生无奈,只得背着20多公斤的硬币回家。(7月19日《人民日报》微博)

不要让乘客伤身又伤心

3000多元的赔偿款,一个月,等来了20多公斤的硬币。这一捆捆的硬币真是背在身上,又沉在心里。一个责任明了的赔偿事件,本可以凭借一个公共服务行业应有的服务精神圆满地得到解决,最后却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真是让乘客伤了身又伤了心。

近些年来,无论是让座,还是丢失的安全锤,公交车上的事件屡屡引起人们的热议。这是因为人们会不自觉地对身边发生的公共事件给予更多的关注。小事件的背后是一个大众群体,谁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亲历者。所以,人们会期待每一个小事件都得到妥善的解决,并为此而鼓与呼。

公交车作为一种公共交通工具,首先应该满足的是乘客的安全需求。然而,行驶在路上,难免会出现一些突发状况。一脚踏急刹,让乘客受了伤已经是既定事实,责任也很清楚,那么,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和解决问题成为事件的焦点。

也曾有媒体报道过,一些地方的公交公司员工发工资都是用投币箱里的零钱,公众为此也深感无奈,但这绝不是普遍现象。如果员工发工资都是这种方式,乘客是可以完全理解的,只要有真诚的歉意和良好的沟通。但如果不是,就有故意刁难乘客的嫌疑了。在这个事件中,乘客是受害者,不仅需要身体上的诊疗,更需要心灵上的慰藉。

公交公司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角色,是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者,为社会上大多数数人提供基本均等化的服务,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导力量。因其大多是由政府提供补贴,一般具有社会公益性质。从本质上讲,政府补贴的来源其实是公民的纳税所得。因此,公众对其所寄予的期望值也就越高,希望它们能够提供便利廉价的产品和优质服务。

然而,20多公斤的硬币和一句冷漠的“爱要不要”,毫不客气地折射出了服务者的服务意识淡薄和高高在上的傲人姿态,这也反映出了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内部管理问题。总体来看,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性服务,公交行业的服务水平和品质一直在不断提升,大家有目共睹。但是,怎样处理好突发事件,从细节上给予乘客更多的关照,从人格上给予乘客更多的尊重,恐怕还是公交公司要真正改善的。 宋华

7月17日,河北省涿源县平定堡镇党委书记岳树旺为女儿办豪华婚礼一事经媒体曝光后迅速引起热议。更为离奇的是,当地镇政府多个部门17日因为参加婚礼而集体放假半天。7月18日,涿源县委决定免去岳树旺镇党委书记职务,责令其退还所收礼金,接受调查组调查。(7月19日《燕赵都市报》)

政府岂能因婚礼放假

镇党委书记为其女儿举办婚礼,再也平常不过。然而,河北省这个镇党委书记为自己女儿举办的婚宴,不仅是收礼多达百万,参加人数多达七八百,而且让人惊奇的是,镇政府当天居然有多个部门集体放假半天。

政府部门何时放假?国务院有《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每年还都下发《通知》,规定的非常详细,各地区各部门需要遵照执行,而不能擅自作出决定。可是,现在,镇政府一些部门在群众的眼皮底下都敢集体放假半天,群众看了之后,心中会怎么想?今天镇党委书记的女儿结婚,放假半天,明天镇长的儿子结婚,又该怎么办呢?

政府部门因婚礼放假半天,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有三:一是群众观念淡薄。政府部门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专门为了哪些特殊的人服务。朋友结婚,前去祝贺,无可非议。但如果整个部门都因此而放假半天,群众办理公事又该怎么办?二是法制观念淡薄。这个镇政府的一些部门居然置国家规定于不顾,视国家法律法规如同儿戏,竟敢私自行使国务院的职权了,胆子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三是功利思想严重。一些人巴结领导,平时苦于找不到机会,现在,书记的千金结婚,如此难得的机会岂能错过?

当前,正值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牢固树立群众观点,是首要任务。好就好在事情发生后,涿源县委处理得非常及时。如果能够再恰当一些,似乎更好。如果仅仅是免去镇党委书记职务,责令其退还所收礼金,接受调查组调查,又容易让人感觉缺点儿什么?放假半天之责让谁承担?此事,从一定意义上说,比多收多少礼金显得更加重要。

解决类似问题,不需什么“灵丹妙药”,一些“常用药”即可。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坚持群众至上,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就会自觉坚守岗位严格履职尽责。增强制度“刚性”。有关制度可谓不少,执行过程中走形变样,多数是“刚性”不足、柔性有余,增强制度“刚性”,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一律平等,“一把尺子”量长短,不仅能遏制违纪违规现象发生,还能教育干部和群众。摒弃功利思想。本职岗位是履职尽责的最好舞台,提高干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既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又无愧于组织,正确处理“对上”与“对下”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利益观,才能以实际行动赢得组织的信任、人民的拥护。

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关键是点滴做起。党员干部经常多到基层走一走、转一转、看一看,多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能力和水平。如果经常只围着领导“打转转”,远离群众、脱离群众,眼前看,可能容易出成绩、提职务,但长远而言,缺少群众的支持和监督,不仅会败坏党的作风,而且滋生腐败,犹如涸泽而渔、杀鸡取卵,得不偿失。 申国华

18日,中央部门集中公开2012年决算,包括“三公”经费、行政经费等数据。截至18日晚9时,记者共查询到80多个部门公布了决算,2012年决算总额达9200多亿元,超出2012年预算2200多亿元,只有不到10个部门的决算支出低于预算。同时,50余部门公布了行政经费,支出达760多亿元。

数据显示,去年大多数中央部委主动压缩“三公经费”,但仍有个别部委支出增加。国家发改委去年安排“三公经费”预算4327.74万元,但最终决算花了4948.00万元,增长14.33%。证监会去年“三公经费”支出决算2800.03万元,与年初预算2774.4万元相比,增加25.63万元。

公车问题也引发了一些糊涂账。例如中国气象局2012年度部门决算显示,其3277个预算单位公务用车保有量却已达4614辆,比2011年多了1000多辆车,至于原因气象局并未在决算报告中作出说明。

此外,2012年中央单位公务接待费14.13亿元,减少0.78亿元,但绝大

部分部门公务接待费究竟花在哪儿很少清楚说明。交通运输部只有一句说明:公务接待费支出939.37万元,主要用于对外开展合作交流和智力引进工作、与国内相关单位业务交流等发生的接待支出。寥寥数语只见开支总额不见支出方向的公务接待费说明的中央部门不在少数,而有些部门统计口径的不明确更令人生疑。司法部2012年公务接待费112.84万元,却不包括多达115万元的外事接待费,而大多数部门公务接待费中均含外事接待费。

对此,网友纷纷表示,公开三公支出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三公开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大幅缩减,有没有科学的预算目标? 国情决定,我国有限的公共税金要投入到公共民生现场的地方太多。记得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审查2011年中央决算报告和中央决算草案时,报告中中央财政的各项支出,在中央本级主要支出项目中,医疗卫生支出71.32亿元,

低于三公消费的93.64亿。不比不知道,一比惊一跳。三公消费虽不全是吃掉的、屁股坐掉的、双脚游掉的,但满足官员的屁股、嘴、腿的并非全是工作所需的开支,比百姓健康生命所消耗的还要多,看来前者比后者还要重要一些,这怎么解释都难以消解民生之痛。

我国财政投入到民生现场之所以相对偏低,一方面也是因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监督制度久未良性匹配。实际上,资金的使用者和百姓都需要建立相互的信任关系,不管民生投入还是“三公”开支,每笔费用支出都要有人动态地、全程地监督,支出数字越具体越好。特别是,在晒了“三公”之后,还得问问为什么有如此高的“三公”支出,减缩“三公”支出的计划和目标又是什么?若只是年年晒“三公”,而不问是否合理,也没有制度性的缩减目标,恐怕最后只会让人产生“晒三公疲劳”,对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民生投入没有任何意义。 周明华

受贿20万元 退赃30万元求轻判



据报道,原广州市流溪河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流溪河林场五级职员(正处级)张庆平受贿案日前公开审理。被告人张庆平承认全部犯罪事实,退还赃款并乞求法院轻判。据悉,张庆平案仅是广州林园系统窝案其中之一,该系列腐败窝案涉案官员共13人。(7月18日新快报) 朱慧卿图

不能以保护乳品业为由掩埋牛奶丑闻

国内乳品市场又曝大新闻——有知情人士爆料称,国内60%以上液态奶都是由奶粉冲兑的,里面还添加了各种香精和添加剂,根本称不上产品标识所称的“纯牛奶”。

在经历过众多乳品市场的丑闻之后,消费者对乳制品的心态可用一个词来形容——提心吊胆。人们离不开乳制品,但太多的刺痛让他们不得不心怀警惕,就担心什么时候又被坑了。那么现在,被曝光的“超过六成液态奶系奶粉冲兑”,会是又一个难堪的乳品市场真相吗?

爆料者的论据,主要是我国近年来进口奶粉的数量激增,而这些价格低廉的进口奶粉,除了一小部分用来做饼干和婴幼儿奶粉外,最重要的用途就是冲兑成牛奶。而用奶粉冲兑牛奶,比直接用原奶成本要低不少,爆料者认为,这就是国内很多乳品企业包括大企业热衷于冲兑牛奶的根本原因。理论上说,牛奶可以用奶粉冲兑,但必须标明是“还原乳”或“复原乳”。但事实上,国内乳制品通常见的标识,都是“纯牛奶”,罕见“还原乳”或“复原乳”,而配料表上,也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生牛乳”,根本不提“奶粉”的字眼。于企业来说,这满足了“纯牛奶比奶粉冲兑更好”的消费心理,但对消费者来说,用奶粉冲兑成的液态奶标

注成“纯牛奶”,就是典型的挂羊头卖狗肉,无异于一种欺诈。国内乳制品市场已经出现的各种怪现象,让任何一种丑闻都有了可能性——三聚氰胺都能昧着良心大规模添加,在纯牛奶和复原乳的概念上玩点小花样,完全有可能。爆料者提出的问题,虽然出于其个人的判断和估计,但却符合乳品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常理,更有进口奶粉数量激增这样的数据支撑,主管部门显然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尽快展开专项调查,如果查明大规模欺诈属实,就必须直面真相,严格处理,不能以“保护乳品业”为由掩盖问题。如果查明并不属实,那也必须拿出充足的依据让消费者放心。 赵勇

安装使用探头不该如此随意

山清水秀,曲径通幽,若是左右无人,年轻情侣的举动未免会有些放纵,岂料无人却有眼,小情侣的亲昵举动还是在监控设备下一览无余。深圳宝安公园西门半山腰清水湖畔安置摄像头多时却无提示,常有情侣在此处亲热被监控拍到,令他们质疑隐私遭到侵犯。

近年来,许多地方都在许多场合安装了各种探头。不可否认,探头在安全监控、预防犯罪、证据保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探头的普及,“探头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随意安装现象普遍,只要有管理权,几乎谁都可以在自己“看中”的地方装上几个探

象,需要调取录像资料还原案件真相,探头就可能会在关键时坏掉,或者重要时段变成空白。

很显然,通过立法的手段,对探头进行管理,实在是迫在眉睫。一方面,要明确规定,哪些地方可以装探头,哪些地方不可装探头;哪些地方的探头可以秘而不宣,哪些地方的探头应广而告之;另一方面,要对探头的日常维护以及视频数据的管理、使用、销毁规定规矩,制定一整套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谁不按程序办,谁失职、渎职,谁胡作非为,那就惩处谁。希望我们“国字号”的公共场所探头安装、使用管理办法能尽快出台! 吴应海

近日,青岛中山公园为了让市民在城市里看到“萤光闪闪”的曼妙夜景,从广西引进了一万只萤火虫。然而这些美丽的小虫仅在青岛待了3天就有一半死去。园方表示,一直到8月25日,每周都会从广西补充5000只萤火虫。青岛市有关动植物专家认为,萤火虫从城区消失,是因为其生存的大环境不复存在,买萤火虫的钱不如用来改善环境。

买萤火虫放生 改善不了环境

从“青岛山坡栽树糊弄谁?树苗一碰就倒,成片死亡”;到“为了增强生态效果”和打造“森林城市”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种树行动,甚至于海边也要种大树,最终因“太多网友有意见”而叫停;再到今年公园大量引进萤火虫,青岛这座海滨城市让人越来越看不懂了。一方面,青岛似乎一直在努力改善城市生态;另一方面却采用了不尊重昆虫植物生态的方式。

萤火虫生长于有水的地方,湿润的环境、没有光污染的暗夜、茂密的草丛、自然的植被环境当中。有植物保护专家指出:萤火虫是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凡是萤火虫种群分布的地区,都是生态环境保护得比较好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萤火虫在地球上消失了,足以证明生态环境已经十分恶劣。从这个角度看,青岛引进的一万只萤火虫在3天内死掉一半,已经说明其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但是,青岛似乎犯了当下诸多城市的一种通病——对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认识和价值判断混乱不清,表现出破坏与追逐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在城市规划上,原本一块完整的生态环境,被道路、住宅等建筑分割吞噬,甚至是圈进商品房开发地块,成了房地产商高价售楼的噱头;另一方面,却又在努力地移植花草树木,打造街头花红柳绿的景观,装扮城市的生态与生机。生态保护如此,历史文物保护亦然,二者如出一辙。

任何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似乎都需要寻求文化软实力支撑,也都需要以动植物的栖息茂盛来表现生态、生机与宜居。有了足够的资源与资本,才想起重拾城市的历史与宜居的生态,这就表明在发展过程中我们遗失的太多。但更为遗憾的是,太多的时候不是在反思,从根本上补救与偿还,而是简单地移花接木,装饰出一个貌似有厚重内涵和花红柳绿的外表。这种现象几乎司空见惯,只不过,引进萤火虫的青岛,将其推高到了夸张与极致。

一座萤火虫无以生存的城市,即使每周引进大量萤火虫“放生”,也掩盖不住在污水治理、垃圾分类、循环利用等诸多方面的短板。城市的生态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需要理性地敬畏,更需要权力归位。日前有媒体报道,环保部门在雾霾治理中同时存在着“监管越位”和“监管缺位”的现象。其实,在城市生态保护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公权力需要尽早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回到尊重自然与生态的本源上去。否则,即使种得活移植过来的景观树,却救不活引进过来的萤火虫——靠引进萤火虫注定完不成城市的生态再造。 燕农

北京有关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对群租说不。《通知》规定,出租房屋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每个房间居住的人数不得超过2人。《通知》要求,应当以原规划设计为居住空间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改变房屋内部结构分割出租,不得按床位等方式变相分割出租。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储藏室等不得出租供人居住。

群租属无奈 禁令是空话

要问这座大都市里的群租有多火,当地媒体几天前非常巧合地给出了一个样本:在东三环附近的每平方米售价高达6万元的高档公寓,一套80平方米的两居室里,竟然住了25个人,除了保留厨房与卫生间,两个房间和客厅全部摆满了上下铺床。这样的居住环境,可能还比不上大学里的学生宿舍。抱怨无空调的大学生们,至少还有一点可以自由转身的空间。一旦毕业自立,反倒在生活中条件上发生了后退和逆转,群租的青春情何以堪。

北京的群租禁令能解这批年轻人以倒悬吗?恐怕未必。其一,这样的禁令,在生活中并无多大执行力。人均不低于5平方米,每间房居住人数不超过2人,这样的标准化数据看上去都很美,可是到底谁去保证如此诱人的居住福利?其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禁令所要“解救”的年轻人,事实上可能是禁令的最大反对者。买不起房,所以才租房。租不起房,所以才会有群租。如果连群租也要禁止,那么谁来给他们一小片容身之地?

群租可能会带来消防、治安等方面的隐患,也常常遭到左右邻居的投诉,这在一定程度上恐怕都是实情。但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未必要对群租一棒子打死。世界从来不是非此即彼,居民反对群租的意见肯定是有,但是更多的年轻人被禁绝了群租,将更无立锥之地,这一点城市管理者为何不能体谅“民情”?有本地户籍的居民是城市之“民”,在这座都市里“漂”着的何尝不是?

按照北京的应届毕业生起薪标准,不要说让他们买房,就是在合适的地段租一套房也是一个妄想。根据媒体的调查,即便是在群租未被禁止的时候,一些大学毕业生的群租支出也已经占到了总收入的1/3甚至接近1/2。虽是艰辛,他们到底还有梦想,还能够安慰自己说,今天的群租,是为了将来能够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南方的某个城市,曾经想出一个通过提高房租来赶走所谓“低素质”农民工的招数,结果被舆论唾弃。群租禁令若无非必要的疏导出口,与逼人离开又有何异?

疏导之法,最终还是要保障供给。既然不准群租,那就应当提供租得起的房屋。在这些层面,业内分析北京的存量空置房约有30万套,这些房子为何没有转化为可租住的房源?房屋持有人宁肯空置,等待时机抛售,也不出租。在保障层面,点线式的公租房根本无力顾及目前的群租者。总量本已有限,对外地户籍人口开放申报的就更少。

如果解决了不供给问题,群租禁令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居住是最大的民生之一,高房价高房租之下,蚁族们除了群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年轻人的梦才是未来中国梦,给他们的梦想留一点点存放的空间,哪怕是群租的空间也好。 周东飞